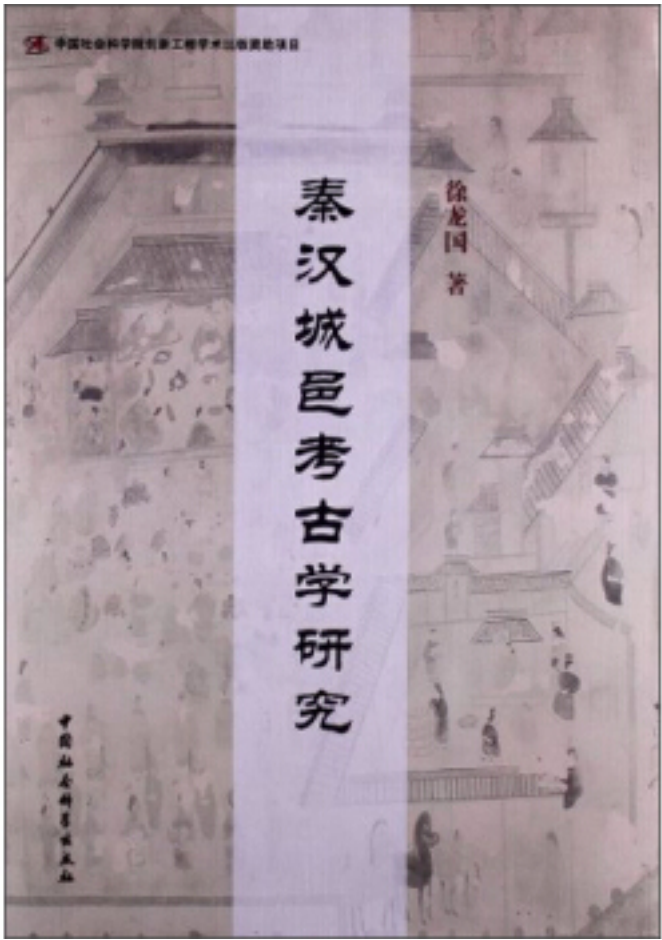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_下载链接1](#)

著者:徐龙国 著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_下载链接1](#)

标签

评论

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斯坦因所获吐鲁番文书研究

书很不错，快递也很给力，要是以后能附上购物清单就好了

看了很久了，专业书真心贵，趁着活动拿下。

好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买第二本了，很厚实的书，定价也很高。

干货很足，对了解中原地区的城市考古，很有裨益。

非常不错的一本书，值得好好阅读和研究！京东送货快！

城市考古学必读的书，知得收藏

可以作为材料大纲备着，需要时查找。

这本书写的不错，系统的研究了秦汉城邑。

很不错，书的质量非常好，值得购买！

纸质印刷不错！平时好贵，只有活动时才买得起

书有点瑕疵，不过不影响阅读，从北京调货到广州，速度略慢

很好很好，总是对古老的城邑感兴趣。

研究秦汉时代古城的专著，不过有些内容略简单些

书是不错，再次吐槽京东的图书包装

这书是硬精装，京东用塑料袋包装的，硬皮都折了角。

收集了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630多座秦汉城址资料

收集了经考古调查与发掘的630多座秦汉城址资料，并将它们进行分区、分级研究。分区主要依据当时的行政区划，兼及自然地理及今日政区划分：分级既考虑当时的郡县制和郡国体制，也考虑到城邑沿用造成的等级差异。为了便于微观观察和宏观把握，书中对单一城址，重点考查其历史沿革、形制布局及文化内涵：对整个时代的城邑，重点研究它们的分布规律、特点以及区域性差异。在分区、分级研究的基础上，对秦汉城邑与秦汉政治体制、社会生活、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探讨。最后，对城邑的发展历程做了纵向考察，研究了中国古代城邑与文明产生发展进程的关系，以及秦汉城邑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等问题。

别人推荐的，还没看，应该不错

书的质量还不错，还没看

考古学的总结性的文献。

秦汉城市综合性的研究著作

如果城址距河流太近，洪水泛滥会冲毁城墙，危及城内安全；如果城址距河流太远，又不利于城邑用水，给河流运输造成不便，防御功能也随之降低。因此如何做到恰如其分，以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是城邑选址时必须充分考虑的问题。
对此，《管子·乘马》就做了阐述，该书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
对照秦汉城邑资料，绝大多数都符合这一城邑选址原则。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对全国数百座秦汉城邑都做了考述，而且还对各区域城邑、城市内布局、城市功能等做了详尽研究，对我很有启发。

难得的经典读物，值得阅读

值得后买的一东西。你不会后悔的。只会醉

考证的算是比较详实。具体还没有深入去看。

好，不错

不错

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代下！
！代下！

好

王世襄（1914.5.25-2009.11.28），号畅安。男，北京人，祖籍福建省福州市。汉族，著名收藏家、文物鉴赏家、学者。他使井市的“雕虫小技”登上了“大雅之堂”，他不但能玩，也能写，他玩物并研物，他玩出了文化，玩出了一门“世纪绝学”，他被称为“京城第一玩家”。2003年12月3日，王世襄从专门来华的荷兰王国约翰·佛利苏王子手中，接过旨在鼓励全球艺术家和思想家进行交流的荷兰克劳斯亲王最高荣誉奖，从而成为获得该最高荣誉奖的第一位中国人。

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国文系，获学士学位。1941年毕业于该校研究院，获硕士学位。是年冬去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任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一年中，经过侦察调查，奔走交涉，追还、征购数批文物，总数达2000余件，一律由故宫博物院接收保管。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次年初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经郑振铎派员接收。旋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

[illegible]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

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研究中最具代表性、最有学术价值的23篇论文，内容分为三类：一是关于敦煌写本的，二是关于出土碑志的，三是在论证过程中使用到敦煌写本与碑志材料的，并按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论文次序。这23篇论文，都曾在《文史》、《文献》、《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汉语史学报》、《古汉语研究》、《中古近代汉语研究》、《唐研究》中发表，在出土文献尤其是手写纸本文献研究中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1925年，王国维率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说法，从此，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量印证，

以考古代历史文化，成了一种公认科学的学术正流。本书作者许建平先生长期从事敦煌出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整理《敦煌经部文献合集》、《敦煌子部文献合集》等大项目的过程中，秉承王氏以来二重证据相结合的优良学术传统，结合传世典籍与敦煌写本、碑志等出土文献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论文，来考证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化，论证传世典籍在传抄、刊刻过程中可能形成的错误。本书汇编了许建平先生从事敦煌写本文献、出土文献研究以来，结合传世典。

二 平面形制

平面形制有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及圆形、椭圆形、梯形、刀形、曲尺形等。在已知形制的190座城址中，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城址111座，方形或近方形55座，不规则形11座，其他形制各约一二座。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占87%以上，成为该地区城址的主流形制。长方形见于各类城址中，方形则常见于小型以下的城址，尤其是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址，并且多数建于汉代，如天津静海西钓台古城、黄骅伏漪城，山东即墨

皋虞故城、即墨沉乡侯国故城、即墨壮武县故城、海阳昌阳县故城、临清东汉贝丘故城、博兴利县故城，江苏赣榆利城县故城等。另外，有大、小两城的，大城多为长方形，而小城多为方形，如河南鄆陵县鄆陵故城、商水阳城故城等。之所以长方形与方形城址最多，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形广大，为筑造长方形及方形城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从发现的先秦城址看，这里具有追求方正的筑城传统。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上述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并非完全都是中规中矩的形制。人们追求方正的愿望，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城址面积较大时，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山川、丘陵、河流、湖泊等地理条件的限制。秦汉城邑一般建在一条河流之侧或多条河流之间，靠近河道的城墙往往并非一条直线。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等，城墙受河流影响十分明显。河南偃师滑城建于滑城河与北河之间的靴形台地上，因此，城址建造也就不得不因形就势。而山东邹县邾故城建于峰山和廓山之间，城墙由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城墙因山而建，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种利用山势筑城，以此提高城邑防御功能的做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

人们在建城立郭时，需要考虑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物产、人口等诸多因素，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是最基本的原则。然而，利与不利是相对而言、因时因地而宜的。河流是建城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城邑用水、二 平面形制

平面形制有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及圆形、椭圆形、梯形、刀形、曲尺形等。在已知形制的190座城址中，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城址111座，方形或近方形55座，不规则形11座，其他形制各约一二座。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占87%以上，成为该地区城址的主流形制。长方形见于各类城址中，方形则常见于小型以下的城址，尤其是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址，并且多数建于汉代，如天津静海西钓台古城、黄骅伏漪城，山东即墨皋虞故城、即墨沉乡侯国故城、即墨壮武县故城、海阳昌阳县故城、临清东汉贝丘故城、博兴利县故城，江苏赣榆利城县故城等。另外，有大、小两城的，大城多为长方形，而小城多为方形，如河南鄆陵县鄆陵故城、商水阳城故城等。之所以长方形与方形城址最多，是因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平原地形广大，为筑造长方形及方形城址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从发现的先秦城址看，这里具有追求方正的筑城传统。

但是，必须说明的是，上述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并非完全都是中规中矩的形制。人们追求方正的愿望，受到地形地貌等多种因素的制约，特别是城址面积较大时，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山川、丘陵、河流、湖泊等地理条件的限制。秦汉城邑一般建在一条河流之侧或多条河流之间，靠近河道的城墙往往并非一条直线。山东曲阜鲁国故城、临淄齐国故城等，城墙受河流影响十分明显。河南偃师滑城建于滑城河与北河之间的靴形台地上，因此，城址建造也就不得不因形就势。而山东邹县邾故城建于峰山和廓山之间，城墙由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上，城墙因山而建，很难做到整齐划一。这种利用山势筑城，以此提高城邑防御功能的做法，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还是比较少见的。

人们在建城立郭时，需要考虑地形、地貌、山川、河流、气候、物产、人口等诸多因素，利用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是最基本的原则。然而，利与不利是相对而言、因时因地而宜的。河流是建城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之一，城邑用水、二 平面形制

平面形制有长方形、方形、不规则形以及圆形、椭圆形、梯形、刀形、曲尺形等。在已知形制的190座城址中，长方形或近长方形的城址111座，方形或近方形55座，不规则形11座，其他形制各约一二座。长方形与方形城址占87%以上，成为该地区城址的主流形制。长方形见于各类城址中，方形则常见于小型以下的城址，尤其是面积在25万平方米左右的城址，并且多数建于汉代，如天津静海西钓台古城、黄骅伏漪城，山东即墨皋虞故城、即墨沉乡侯国故城、即墨壮武县故城、海阳昌阳县故城、临清东汉贝丘故城、博兴利县故城，江苏陵、河流、湖泊等地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_下载链接1](#)

书评

[秦汉城邑考古学研究_下载链接1](#)